



何为“古今中西之争”？



提问：许奕智 共青团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委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请问，何为“古今中西之争”？

解读：李勇刚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中国传统文化教研室主任

类似“古今中西”的问题，在古代思想史中也碰到过。比如，先秦时期就有“法先王”还是“法后王”的争论，反映了当时的“古今之争”；佛教传入后与儒道两家的冲突与调试，可被视为当时的“中西之争”。一个文明体在长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大概会在时间轴或者说“历史”层面上碰到如何处理当代与前代的关系，也会在空间轴或者说“地理”层面上碰到如何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中华文明不乏在这方面的探索。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在交往交流方面取得诸多成果。但是，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这种交往交流还不足以对二者各自的特性构成根本性的影响。在中华文明当时已知的“天下”范围内，更是难以找到与之相提并论的其他文明。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大航海时代之后。16世纪末至18世纪初，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等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历法、数学等知识。对此，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呈现出几种不同的态度，“古今中西之争”开始萌芽。比如，徐光启、李之藻提出“会通以求超胜”的观点，主张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有所超越，于是积极译介西学。这种取向被清代王锡阐、梅文鼎等人所继承。黄宗羲虽然认可西方天文历法的准确性，但认为其为中国所固有。与此相反，明代邢云路、魏文魁等人则固守中国旧有历法，反对西法。此外，还有不少有人认为西方天文历法是“不可易之法”，不承认中国原有历法的价值。

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强力叩开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悲惨境地。究其实质，乃是西方新兴工商业文明对中国传统农牧业文明的“降维打击”。要应对这一挑战，必须向西方文明学习。这是一个“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的过程。在“言技”的阶段，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主张在不触动既有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则把西方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反对向西

方学习，幻想恢复“闭关锁国”的局面。双方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修筑铁路、开矿山、兴电报、派遣留学生等许多问题上都曾激烈论战。洋务派的主张在1898年被张之洞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后来聚讼纷纭的“中体西用”。在19世纪中后期，还有一派倡导“西学中源”说，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因此向西方学习只是“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这种说法源自黄宗羲，在鸦片战争后由冯桂芬、郭嵩焘、曾纪泽和郑观应等人大大倡导。在洋务运动时期，该学说长期作为“中体西用”说的补充论证，与后者相互交织。

而到戊戌变法时期，此前具有进步意义的“中体西用”说，因为强调固守传统政治制度和伦理纲常而成为进一步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障碍。此时，“西学中源”说反倒成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改良派一时的助力，因为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之类的观念，特别是议会、学校之类的制度，都可以打着中国“古已有之”的旗号而照单全收。但是，该学说在学术上存在牵强附会的硬伤，到后来连改良派都只好放弃。戊戌变法时期，荣禄、徐桐等顽固派抛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论调，攻击民权学说，反对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在这次激烈的“古今中西之争”中，顽固派用政治权力镇压了变法，改良派却在思想文化领域拓展了自身的影响，并且在变法后持续发力。几年之后，清末新政反倒重拾了戊戌变法的诸多做法，但此时已于事无补。

辛亥革命失败，促使人们从民族文化上寻找原因。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古今中西之争”逐渐进入“言教”的层面，在学术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烈度和广度。这些争论极为纷杂，这里只能举其要者。20世纪第二个十年，以陈独秀等人为主力的《新青年》与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之间就文化问题展开论战。陈独秀把东洋文明归结为古代文明，而把西洋文明归结为近世文明，还认为中国固有思想不适合当代社会。之后，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要用中国传统文明救济西方并拯救中国。胡适则提出“东方的文明的

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并认为后者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20世纪30年代，甚至有学者提出“百分之百的全盘西化”，认为西洋文化在宗教、政治、道德、经济和社会方面都优于中国，是世界文化的趋势，要想在这个世界生活只能适应这种趋势。与“全盘西化论”针锋相对，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认为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和“一定的时代性”，因此要“特别注意于此时此地此地的需要”，并提出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口号。该宣言在当时引发持续较长时间的大论战，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文化出路到底是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此外，围绕“古今中西之争”的问题，民国时期还有大量的争论，比如“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等等。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认为这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这些都显示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超越“古今中西之争”的努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的展开，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热”在知识界逐渐兴起。人们在对此前激烈反传统的做法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古今中西之争”再次浮出水面。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学术界围绕现代性展开讨论，逐渐兴起所谓“新启蒙”运动，一些被称为“自由派”的知识分子通过译介西方学术思想，阐释并宣扬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之类西方现代社会理念，同时对传统文化展开批判。不过，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和传入，学术界开始反思现代性对人的异化。一些学者主张重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智慧。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学热”逐渐兴起。传统文化大量进入大中小学教材，民间兴起汉服、读经、国潮等运动。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学者吸取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等思

想资源，对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信仰真空进行反思，反对庸俗的自由市场理论，重视社会公平正义。

总的来看，在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争”的问题上，一种倾向是把“中西之争”归入“古今之争”，认为中国文化已经过时，西方文化代表现代化的方向，因此需要批判中国文化、学习西方文化；另一种倾向是把“古今之争”化为“中西之争”，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别只是民族性的差别，即便学习西方现代文化的长处，也要以中国固有文化为根本。两种倾向向共同的问题，在于背后的文化还原论预设，即认为有一种凝固不变的文化样式。但是，文化恰恰是在相互交往交流中不断演变、动态发展的。空间轴上的“中”与“西”，经过在时间轴上“古”与“今”的斗转星移，各自都呈现出与之前迥然有别的面貌。

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学习源自西方但又批判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更高层次上融汇中西文明之精华，让古老的中华文明在现代社会得以更始重生。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在实现“站起来”之后又探索“富起来”与“强起来”的道路。基于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在新时代，我们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有条件会通古今中西的文化成果，促进外国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破解“古今之争”，要求我们做到“不复古”“不守旧”，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破解“中西之争”，要求我们“尊古”“守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充分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深知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而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时代答案。西方现代文明为促进人类在社会经济生活层面的全球化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但其个体本位的倾向难以为全人类的和谐相处、团结一致提供思想支撑。当此之际，中国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致力于在全球层面达成更高层次的公共性，体现了对“古今中西之争”的全面超越。

纪检监察干部应把握好的“十个度”

□ 鲁 浩

纪检监察机关肩负着党内监督和國家監察專責，纪检监察干部承担着正风肃纪、纯洁干部队伍的历史重任，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必须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重 要讲话精神，勇挑重担、敢打硬仗，准确把握好纪检监察工作中的“十个度”，把自己锻造成为全面从严治 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 硬钢铁”。

对党忠诚的纯度。天下至德，莫大于忠。政治过硬、对党忠诚是纪检监察干部最本质的政治要求。忠诚才可靠，可靠才堪用。必须做到自觉地、绝对地、纯粹地、无条件地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纪检监察事业。任何时候都做到光明磊落、襟怀坦荡，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移其志、不毁其节，忠心听党话、铁心跟党走。

理论修养的高度。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没有足够的理论清醒，思想就会“生锈”，行动就会走偏。要把加强党的理论素养作为必修课，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在学思践悟中担当初心使命。

胸怀大局的气度。器量须大，心境须宽。在纪检监察这个看不见硝烟的无形战场上，从来不乏刀光剑影，也难免会受委屈落埋怨，甚至会危及生命安全。这就要求纪检监察干部拥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胸怀和气度，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处人所不能处。以敢于担当的浩然正气、恢宏志气、铮铮骨气，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惩恶扬善。

纪法素养的厚度。律令格式，为政之本。党章党规党纪和宪法法律法 规是开展纪检监察工作的依据和准绳。纪检监察工作具有较强的政治性、政策性、专业性、严肃性，要深刻 理解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讲政治和讲法治的内在一致性，养成纪法双 施双守的思维习惯，学会用规范的程序保障监督执纪问责和监督调查处 置职能的有效发挥。

敢于斗争的刚度。人若无志，纯铁无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斗争中成长提高，努 力成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勇士”。反 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 争。纪检监察干部生来就是和矛盾、问 题打交道，和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影响 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人和事作斗争

的，务必练就“金刚不坏之身”、练就高超的斗争本领。当前，腐败和反腐败较量依然激烈，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急难险重”是检验纪检监察干部忠诚担当的试金石、锤炼纪检监察“铁军”的重要战场，唯有敢于啃最硬的骨头、接最烫手的山芋，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去，方能在正风肃纪之路上不辱使命。

言行举止的刻度。小节不可小视，小处不可随便。王阳明弟子与其有以下对话：“己私难克，奈何？”“能克己，方能成己。”克己，本质上是一种深度的自律。纪检监察干部维护政治权威、执行纪法规定、守护公平正义，面对的监督受到的关注更多，更要谨言慎行、藏锋藏慧，做到出言有尺、行为有度。

交往交友的尺度。无事常如有事时提防，才可以弥意外之变。别有用心的 人挖空心思、处心积虑的“围猎”；各种“朋友”“老乡”“同学”“企业家”的“无事不登三宝殿”，令人防不胜防。这就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在结交朋友方面要慎之又慎，做到心中有数、往 来有度，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管家治家的力度。严是修身之要，唯严者邪不侵身。家风连着党风，家廉才能政廉。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

事，而是关系党风政风的大事。干部作风是社会风气之源，己身不正焉能正人？纪检监察干部要树立“先正己、先做人”的理念，把管好“身边人”作为正己的起点，正确处理自律和他律、信任和监督、原则和感情的关系，筑牢“防火墙”，做到廉洁齐家。

作风严谨的精度。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纪检监察工作贵在精准、难在精准，必须在精准上下功夫，自觉培养严谨细致的作风，不断提高监督执纪问责的科学性、实效性和公信力。善于从小处着手，保持“严、细、深、实”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准确把握“三个区分开来”，严格划分“失误、错误”与“违纪、违法”的界限，做到事实清楚、定性准确、处理恰当。

处事科学的法度。章法有度，自成方圆。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用、纪法情理贯通融合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要历史经验。必须一以贯之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公道正派的立场核查问题，以坚守原则、讲究政策的原则处理问题，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激励保护干事创业积极性。

（作者系河南省纪委监委宣传部副部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和推动领导干部不断提高思想觉悟、精神境界、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作为中青班学员，我有幸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切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年轻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殷殷嘱托、深深期盼。我体会到，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的问题，是政绩观的根本问题。政绩观正确与否，不仅影响干部个人成长，更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记之于心、践之于行。

以坚强党性为基石。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加强党性修养，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制胜法宝，也是每一个共产党人的终身“必修课”。在邵阳，我们在全省率先建立领导学 考学制度，党委（党组）确保 班子成员每人每年至少领学1 次；各地各单位以参加1个月 以上主体班调训或5天以上专 题培训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为述学主体；以党章党规党纪、党的创新理论等为主要内 容，带动全市党员领导干部一 季度一考学，推动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许多领导干部感慨： 实施领导学 考学后，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否则就会领学领不 到要义、述学述不中要害、考 学考不出水平。党性是党员干 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 基石，党性强才有牢靠的政治 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 抵腐定力，才能听党话、跟党 走，党的领导才能“如身使 臂、如臂使指”。

以为民造福为己任。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 绩。在基层工作，我坚持新官 理旧账，集中攻坚办好民生实 事，推动一批重大民生项目迅 速投入使用。在邵阳，我们从 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支 部主题党日、双重组织生活、 党员“政治生日”5个方面下 功夫，让党员始终牢记第一身 份，凝聚起团结拼搏、一起向 未来的强大动力，解决群众身 边问题5.1万多个。在全力为 民纾困解忧过程中，我对“人民 至上”的认识更加全面，对 “以人民为中心”的领会更加 透彻，对“‘国之大者’就是人 民的幸福生活”的理解更加充 分，对“把好事事实做到群众 心坎上”的重要要求把握更加 准确。

以高质量发展为追求。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 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就 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在 株洲市攸县担任县长期间，我 顶住压力、克服困难，坚持逐 矿依规操作到位、资金奖补到 位、覆绿治理到位，顺利关闭 数十座小煤矿，淘汰落后产能。 在邵阳，细化完善高质量发展 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推动全市 上下以求实的态度、务实的作 风、扎实的工作、真实的业绩 为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多年 实践让我明白，只有将新发展 理念变成“指挥棒”“红绿灯”，才能让一方发展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 全，才能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以实干担当为抓手。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空谈误

年轻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 龚红果

国、实干兴邦，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实干担当，既需要世 界观，也需要方法论，重点是要 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 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 真正把小事办精、把大事办 好、把急事办妥、把要事办 准、把难事办成。依然记得， 2019年我从省委组织部到芷江 担任县委书记，为扭转局势、 打开局面，坚持用深入细致的 警示教育、谈心谈话等举措让 干部迅速放下思想包袱、轻装 上阵、创先争优。我走遍了84 个贫困村并每周进行会商、督 办、通报，始终坚持一线指 挥、一线督战，打好打赢了政 治生态修复、脱贫攻坚、疫情 防控三场硬仗。一路走来，我 理解实干担当就是要“实”字 当头、“干”字为先，不能有 大干快上的冲动，不能急功近 利、急于出成绩，要实事求是、敢于担当，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以清正廉洁为本色。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全党同志都要明大 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 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 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葆清 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清正廉洁 不但是行稳致远的护身符，还 是促进发展的生产力。在芷江，我坚持每月到 园区现场办公，努力构建起亲 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营商 环境持续优化，得到广大企业 家的一致好评，园区发展从 “门可罗雀”到“门庭若市”， 园区排名在全省大幅跃升。只 要严于律己不逾矩、严负其责 不懈怠、严管所辖不松劲，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就有保障。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 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需要知行合一、一张蓝图绘到 底，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 功，辛苦指数才能换来群众的 幸福指数。

（作者系湖南省邵阳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